

杨杰宏 著

驮马故事



茶马古道民族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杨杰宏 / 著



龍塘故事 茶马古道民族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 / 杨杰宏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5482-1776-3

I. ①龙… II. ①杨… III. ①民族志—龙蟠乡 IV.
①K280.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8351号

策划编辑：柴 伟

责任编辑：陈 曦

李 平

责任校对：严永欢

装帧设计：刘 雨



龍蟠故事
茶馬古道民族志

杨杰宏 /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31.5

字 数：530千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776-3

定 价：60.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3244 65031070

E-mail: market@ynup.com

潜龙在天，飞龙在地（序一）

白庚胜

继《溪村社会》《纳西族民俗概论》《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当代转型民族志》之后，纳西族青年学者杨杰宏先生的又一部纳西学力作《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即将出版。对于它的问世，我谨致热烈祝贺，因为它为纳西学送来一股清新的风，为纳西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于纳西文化研究而言，田野调查并非始自今日。较近的如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俄裔美籍作家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我国学者周汝诚的《永宁见闻录》，赵银棠的《东巴圣地——白水台访问记》，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李近春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戈阿干的《滇川藏考察实录》《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源流考察》，鲍江的《象征的来历——叶春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推远者有徐弘祖于明代写成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片段、余庆远作于清末的《维西闻见录》局部内容。它们有的关注纳西族社会历史全像，有的热衷于摩梭人家庭婚姻形态，有的聚焦东巴文化艺术，有的倾心于民间风俗习

惯，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对纳西文化的存在状态做了或整体，或局部，或专题，或全景，或定时定点的记录，给当世及后人留下记忆深刻的学术遗产。可以说，杨杰宏先生的《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首先是对纳西学这一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对纳西学这一正确方向的严肃坚守。

纳西文化固然被象形文封存于千卷经书之中，固然被汉字书写于大量的正典野史之内，但需要纳西学学者始终清醒认识的是：纳西族不是已经消亡的历史民族，她依然生机勃勃地生存于横断山脉深处；纳西文化尚未湮灭，她依旧自我演进，并正在经受外来文明的冲击与洗礼。因此，纳西学的生长点存在于回答纳西族生存、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中，纳西文化研究不能离开田野，不能离开现实。而这正是杨杰宏先生新著《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不同于以往同类成果之特色所在。更何况，其中还交叉使用了文献、考古、统计、比较的方法。这是他对纳西学田野作业学术传统的一种发展与提升。他的学术目的不是为了记忆而记忆，不是为了认知而认知，而是充满了变革的精神、发展的诉求，并始终根植于自己的土壤之中。

《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以文学的笔调始终聚焦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全景式地梳理了它在茶马古道上的前世今生，细致入微地辨析了它在茶马古道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具体深刻地揭示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对其文化个性塑造的决定意义，并开具了重振龙蟠雄风的良方妙药。它使我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更加确信人类学的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只要尊重传统、关心地域发展、关怀人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整个学术构建，责任心、使命感、良知就必然贯彻于全部理论思维——这就是《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的基本价值及其留给读者的强烈印象。当然，龙蟠的振兴是否仅有旅游或主要靠旅游一条路则另当别论。因为切不可忘记，旅游虽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但它也是文化遗产的主要杀手。

无疑，作为茶马古道丽江线段上的关键点之一，龙蟠乡曾经有过辉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这是遗产，但也是桎梏，对于当今的丽江、玉龙、龙蟠的子民来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继承传统、活化遗产、转化资源，作有效的战略转移、战役设计、战术实施。遗弃传统固然十恶不赦，但沉湎于历史不能自拔也是自欺欺人。

对我而言，阅读《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除了审美龙蟠的奇山丽水、漫游烟雨袅袅的村村寨寨、细括土风社情的林林总总、检点历史现实的斑斑迹迹，更主要的意义还在于用现代视野审视古文化孑遗、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学思、以人文情怀光照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说从《江村调查》《三下江村》走来的费孝通先生最终解决了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对立的矛盾，大大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并达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杨杰宏先生通过继续深化对茶马古道沿线社会文化的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成功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文化振兴与产业繁荣、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我们期待着。

对于纳西族及纳西学来说，茶马古道及其文化是重要的存在。故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有一批纳西族干部、群众及学者投身于探讨其秘密、揭示其精神、利用其遗产的社会、经济、学术活动。如，云南大学中文系木霁弘先生不仅首次成功组织对其全线的考察，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学术概念，而且在其后组织多种论坛、研讨会、丛书，创办文化研究所，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丽江不仅修复了有关线路、驿站，开辟了有关徒步旅行线路，还建立了有关博物馆，举办了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艺术节，创意了茶马古道商队过古城的旅游表演项目，目前又在配合云南省人民政府申报茶马古道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作种种努力。这一切都卓有成就，也难免教训多多。主要的遗憾是学术积累不足、学者参与有限、学术武装缺失，导致功利性明显，浅尝辄止比比皆是，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茶马古道文化精神，降低了茶马古道文化品位，亟待扭转其方向、深化其内涵、提升其质量、推进其建设。杨杰宏先生之《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正有将此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

目前，除了对丽江古城、束河古城、龙蟠乡几个节点有所了解外，我们对茶马古道丽江线段的客观情况依然所知甚少，并大都满足于文学性的浪漫、零零散散的忆古、旅游开发的冲动。我认为，要振兴茶马古道及其沿线，尤

其是丽江线段的社会、经济、文化，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譬如，我们应当抢救性记录茶马古道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历；抢救性收藏茶马古道形形色色的文物；抢救性修复茶马古道及其有关关隘、驿站、店铺线路；系统开展对金沙江两岸茶马古道线段历史、民俗、语言、宗教、地理、动物及植物的田野调查，并将此与鹤庆至丽江、剑川至丽江、丽江至维西、丽江至中甸、丽江至永胜、丽江至宁蒗几个线段的有关工作相衔接，尤其不能将香格里拉县境金沙江东岸的纳西文化视如“化外之区”永远不闻不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整理、利用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并建立起有关学术体系。这表明，杨杰宏先生之《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只是迈开了可喜的一步，而不是穷尽了茶马古道丽江线段及其文化研究的一切。对于他及其同仁来说，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尤其是面对旅游业之冲击、金沙江开发热之裹挟、城市化进程之提速，抢救性保护、传承这笔文化遗产更显迫切。

好在继戈阿干先生开启这项艰苦的事业之后，已经有杨杰宏先生接踵走上了这条坎坷且光明的学术道路，而且走得异常踏实，更具社会意义，更加富有成效。目前，在他的周围还集聚起了一群纳西学俊秀，他们从历史学、语言学、体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集体攻关，一个群雄逐鹿、各领风骚、全面振兴纳西学的时代正在到来。对于这个学术群体的成长，我

的期望是：始终关注纳西族的生存发展，促进纳西族社会的进步繁荣，成为纳西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智者、良心、道德，为人类文明及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龙蟠是丽江境内最令我难以释怀的乡镇之一：我曾在一梁之隔的文海任教；我有许多同学挚友至今在那里生活、工作；我曾在龙蟠新尚村受教于天才歌手和成典大师并记录下近40部纳西族民间长诗；我曾十余次穿行在它的土地上去迪庆调研。因此，龙蟠壮美的山河、勤劳智慧的人民永记我心；龙蟠近30年来的踽踽前行、鲜少变化常令我牵挂；龙蟠未来的生路、发展方向总让我忧思。所庆幸的是，在乡党委及乡政府的领导下，龙蟠人民已经开始一场以保护、利用茶马古道文化为切入点的大突围，并正在致力于解放思想、重建精神、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建设一个绿色、文化、富足、和谐的新家园。令我感动的是，在杨杰宏先生的引领下，纳西学青年力量正在悄然移师江边、移情龙蟠，配合、参与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我相信，内外力量的互动、政经文化行为的结合，必能让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再次造福于它的创造者、传承者、发展者。

衷心祝愿龙蟠“潜龙在天，飞龙在地”！

是为序。

2012年4月5日

走进茶马古道的新田野（序二）

杨福泉

2010年7月，我回丽江参加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天走了从玉龙县拉市乡到龙蟠乡的茶马古道，随后又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政协主席和秀琼等人一起去考察茶马古道的几个古村落以及著名的龙蟠渡口。我的学生杨杰宏博士也一起前往。途中知道他参与此次会议的筹备，已经在龙蟠乡走村串寨做了认真的田野调查。时隔两年，杰宏竟已经写出了这本《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全书基于认真的田野调查，可见其用心学术，专注田野第一手资料的治学精神和踏实学风。

我曾在《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①中谈了如下观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茶马古道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多学科、多行业、多角度的重视，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书籍。但就笔者所见，目前关于茶马古道的论著，除了部分是从历史、宗教、民族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功力比较深厚的论著之外，更多的是边走边看边记录的游记和图文实

^① 杨福泉：《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19期摘载。

录，而严谨地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深钻细研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民族志等还很少，特别是对沿线的村镇、商帮及其经济和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细致调研的还不多见。我自己也曾写过一本文图兼备的《西行茶马古道》，我觉得类似的书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写这样宏观谈论茶马古道整条线的书，而忽略了对这条古道沿线的村镇和人事进行认真的调研。

在丽江那次茶马古道的研讨会上，我也举了杰宏等几个丽江青年学子（《阿喜渡口民族志研究》）在茶马古道沿线村子调研的例子，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茶马古道的新气象。如果这样对茶马古道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逐渐多起来，我们将会从这种细致入微的田野民族志积累中，对茶马古道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一砖一瓦的积累，我们是很难建构起“茶马古道”研究的学术大厦的。

茶马古道是马蹄踏出的辉煌，因其线路多在西南边地高山峡谷间蜿蜒盘旋，往往为中原史家所忽略。与汗牛充栋的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路遗产的文献记载相比，茶马古道文献记载确实乏善可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古道所蕴涵着的历史价值的逊色，反而突显了它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二战”后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大陆交通线，国难时期撑起了一方危局，从中足见其历史贡献。正因为茶马古道在文献记载

中甚少，且多穿越高原极地，所以对它的探知意味着必须深入实地，老实实在地行走、体验、访谈、考察。20年前，云南的几个青年学者也是在这样的行走过程中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而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层拓展更需要这样持续地“行走”下去，走实走深，方能走出一方天地。

茶马古道是由点、线、面构成的文化体系，正如前文所言，就当下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而言，除了几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钩沉梳理、深入探寻的力作外，以行走观察沿线民俗风物和进行面上评论的作品居多，而扎扎实实立足于点的实证调研并不多，由此影响了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拓展。本书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书中所言，“通过茶马古道一个典型乡村的民族志深描来揭示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茶马古道上的一点来联结它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区域，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个案研究。于是就有了写一本茶马古道民族志的想法”，而龙蟠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丽境大渡，总归阿喜。”龙蟠地处丽江、大理和迪庆藏区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带，在茶马古道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至今今天仍留存着丰厚的茶马古道文化遗留。通过对龙蟠一地的民族志“深描”，可以对这一区域的文化构成、民族关系、经贸往来、宗教共融有个由表入里的切实认识，其间，茶马古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世界已经形成古迹的诸多线路遗产相比，茶

马古道至今仍活着，不少原来的老路仍在运转，而且仍有不少当年的赶马人还活着；好多茶马故事、赶马调、马帮传奇仍在这块土地上流传着。这也是选择田野民族志这一学术利器的理由所在。杰宏不管是在读研深造期间，还是在丽江、北京工作时，一直行走在滇西北高原，行成于思，从《溪村社会》《纳西族民俗概论》到博士论文《族群艺术身份的建构与表述》，无一不是行走田野结出的硕果。这次，他把学术视野转向茶马古道，并定位于龙蟠，也是多年秉持的学术路径的坚守与深化。

在两年多的调查中，杰宏走遍了龙蟠的山山水水，对方水土倾注了深沉的关怀：走村入寨，与田间老农共话茶马旧事今情，钩沉古道沧桑；奔走于悬崖荒野，破庙古渡，辨识断碑残碣，捡拾失落的文明；寻访那些高僧、名士、儒商的后裔，直面命运多舛的时代风云，还原被遮蔽和曲解的历史；重温古道苍茫，用脚步丈量茶马古道的长度、温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为龙蟠一乡树碑立传，而是把龙蟠一地的历史文化、现实情境置放于茶马古道这一大历史下，由此来写“茶马古道”这部大书，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悦读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第二特点。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学术文章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主因是里面的教条框套太多，陈规相袭，其实学术不只是说理，更是说事，深入浅出、返璞归真才是至境。就民族志而言，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列维·斯特劳斯

（Lévi - 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无不如此娓娓道来，意味深长。民族志无非是为所研究、描述的对象服务，我们不能盲从西方眼花缭乱的理论沼泽而不能自拔，而应根据实情量体裁衣，运用多种有效手段为研究对象服务。本书中既有写实风格的地名考证、地方档案辨析、田野实录，也糅合了作者本人的感悟、思考。这种夹叙夹议，形散神不散的叙述风格不仅深化了文本的理解，也增强了文本的悦读性。所以，比起以往强调写实的田野报告而言，这种尝试无疑具有实验民族志之风，值得提倡。

悦读性源于文本的活态性。民族志不可能完全达到客观、真实、理性，自以为是的客观真实往往带有片面性，所以多角度、多时空、多方位的视角转换是必须的；同时，民族志不纯粹是坐而论道或描述客观事实，理想效果往往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茶马古道上的诸多历史风云已经变幻成了传奇、故事，而其间史实有多少则无从判断，但这些传奇、故事无不蕴涵了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因素，因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这些传奇、故事虽不是史实，但又属于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现实与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肌脉中得以融合。作者在梳理龙蟠茶马古道的历史记忆时，把现存的古迹、文物、文献作为重要的物证，但因这些“物证”大多残缺不齐，所以更多转向了田野口述史。这不只是起

到了以野补正之作用，而且更吻合“活着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情境。因为这些当事人心目中的茶马古道鲜活如初，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仍在跳动的历史脉搏，感受到茶马古道并未远去，仍在时代风云中穿梭、延续。

另外，本书值得一提的一个亮点在于以古论今，古为今用。写历史往往滑入泥古歧路而迷失方向，作者并没有一味地鼓吹复古之风，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文化，而是基于传统之道的理性认识，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方向、现实应用、旅游选择、保护传承提出了独到的思考与建议。作者认为，茶马古道研究不能单一地为旅游经济服务，而是应该打通历史脉络，弘扬其主体精神，促进不同民族、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的交流、理解、合作，以期达成共荣共赢的大同格局，这无疑是茶马古道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化宗旨所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这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地方文化读本，而是一本关于茶马古道意蕴深远的、融纪实与理性思考为一体的力作。

茶马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横亘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间，只有不断地深入其间，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度研究。田野也是历史，而且是历久弥新、常走常新的一部大书，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走入茶马古道这条永远的新田野。

谨以上述感言，表达我对杰宏的祝贺与共勉。

2012年10月14日

茶道可道（序三）

木霁弘

茶马古道，作为新之研究命题，发端于20世纪80年末，经20余年之发展，今已大兴。其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茶马古道学”之谓。19世纪末，西人李希霍芬（F·Richthofen）首提“丝绸之路”，至此成“一学”，伯希和、斯坦因等论著迭出，而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大家对此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开创性的拓深，由此流风所被，历久不绝，百多年“丝绸之路”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丝绸之路”享誉世界，但令人遗憾的是话语权并非由中国人拥有。

的确，在当代，“茶马古道”之所以出现，并在20多年的学坛上引人注目，实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应当珍惜这话语权，将茶马古道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让其真相得显，本质了然，准确地梳理和把握“茶马古道”这条古道的文化和历史，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

茶马古道是跨区域、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线路遗

产，对它的研究也需要宏观的学术视野及多学科基础，同时又要顾及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宏观的理论构建乃基于长期深入的实证研究，二者不可偏废。没有实证研究，尤其是大量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理论构建成为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没有深厚的理论涵养，实证研究则成为一盘散沙，自说自话，也可能陷入地方中心话语构建的泥淖中。“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概念成为实体名词，茶马古道学也呼之欲出，此诚基于这一概念契合了历史本真，呼应了民众心声，由此展现出蓬勃的学术生机及学科动力。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纷纷介入对这古道的研究中，使茶马古道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中引人瞩目的学术盛事。

杰宏是我硕士研究生弟子，以纳藏宗教语言关系为研究课题，用功甚勤，在资料上广为涉猎，且实地踏访了滇藏间文化遗留地，显现出了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为以后的学术攻关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为茶马古道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材料准备。年前收到杰宏寄来的书稿，披章览文，如山阴道中行，流连忘返，掩卷之余，感慨颇多。

杰宏近年来一直奔走于滇西北高原的山水间，深入到这一区域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中，且行且思，成果不少。此书乃厚积薄发之作，全书 50 多万字，结构严谨，材料丰